



懷仁之驛

半年刊

魯汶南懷仁基金會 · Vlamingenstraat 1 · B-3000 Leuven

2024年12月 · 第36期

內容摘要

社论：罗马对华政策是四位教宗的成果，教宗方济各值得我们鼎力支持1
 韩德力神父

梵蒂冈与中国延长任命主教协议3
 Cindy Wooden

第十五届南怀仁国际学术论坛主题“世俗化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4
 Paul R. Gallagher 总主教

以隐修士的视角，在默观中审视世俗社会5
 Dom Bernardus Peeters osb

从中国基督化到与中国及其人民对话6
 韩德力神父

教会与社会10
 德凯瑟枢机

教宗方济各对比利时的访问，加深了比利时教会与中国教会之间的联系13
 Andrea Gagliarducci

当西方遇上东方：台北利氏学社17
 丁立伟神父

何语传教士汉学家及其被遗忘的何语汉学著作18
 郑永君

传教士们的陵墓，今天向所有人传递信息20
 韩德力神父

中国主教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我们在共融中21
 Andrea Torniell

北京教区新助理主教——甄学斌22
 Marta Zhao

正定殉道者——荷兰主教文致和22
 安多尼

照片报道24
 编辑组

罗马对华政策是四位教宗的成果，教宗方济各值得我们鼎力支持

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

当教宗方济各于2018年与中国签署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时，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即使现在正在第三次续签“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这次的协议甚至续签四年，我们依然全力支持。因为尽管在罗马和北京共同签署协议的最初几年，仅任命了几位主教，人们对此有些失望，但现在的情况正在逐步向前迈进。目前中国教会部分关键教区正在筹备新主教的任命，这正是协议的重点。众所周知，中国教会现状远不如二三十年前。教宗方济各认为，如果按照一些教会领导人士强迫圣座与北京走对抗之路，这将会使中国教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我们认为，教宗方济各当前的对华政策理应得到教会内部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最重要的顾问、帕罗林枢机和切利总主教都曾访问过中国，他们了解中国教会内部的最实际的需要，这是获取中国教会真实信息的最可靠途经，我们有理由相信圣座对中国教会的了解比我们很多人更清楚更透彻。

只有回顾一下梵二会议的召开，和教宗保禄六世以及他的前任们的对华政策的历史事实，才能全面理解教宗方济各现在的对话政策同他的前任们是一脉相承的。教宗保禄六世是推动与中国政府开展对话历史性的先驱，早在1965年，梵二大公会议在《祂的教会》通谕中，对话是全文通谕的重要信息之一：“教会必须与世俗化的世界对话。”教宗保禄六世不仅在通谕中指出，而且早在1970年美国总



教宗保禄六世

社论

统尼克松和基辛格突然访问中国之前，他曾作为伟大的朝圣者跨越亚洲，率先打破了当时与中国合作的障碍。他希望通过香港作短暂停留后再结束他漫长的亚洲之行，当时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仍然持敌视态度。当教宗保禄六世携带着一封致中国的书面信函到达亚洲时，人们非常担忧教宗的信函内容。教宗保禄六世访问香港时，英国和台湾当局就催迫教宗撤回向中国人民表达友好愿望的内容。当时我站在离教宗十米远的地方，参与了教宗的共祭弥撒，教宗显然黯然神伤，缓慢而大声地读出了他向中国说的一句话：“我向所有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无论你们身在何方……。”在场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当时他的声音是那么的低沉而无奈。

但教宗保禄六世并没有放弃他的初衷，他很快回到罗马，仅仅一个月后，他就访问了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他的演讲中，教宗赞扬了粮食及农业组织对世界的卓越贡献，但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为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联合国尚未有中国代表深表遗憾。这位天主教教宗率先提出了打破世界对中国的限制，这种划时代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言论，甚至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还要早。当时台湾代表参加粮食及农业组织会议，梵蒂冈与台湾（至今仍然）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台湾本身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势不两立，然而，教宗保禄六世却为中国大陆在联合国争取权益。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促进与中国对话方面的贡献与保禄六世同样令人瞩目。很多人都记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反对波兰及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很少人记得当时年轻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2年为纪念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所作的演讲。他也是与中国对话的先驱，毛泽东去世仅仅几年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超越过去所有的误解，建立友好关系。”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当圣母圣心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创立南怀仁基金会，旨在促进与中国开展对话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自给我指导性建议，他对我说：“你到中国去，和那里的主教、神父及信友交谈，问问他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然后他补充道：“如果可能的话，请与政府当局交谈，我们更需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多年来，在我每次访问中国后，教宗都迫不及待地听取我的报告，并鼓励他周围那些不主张对话的人，行动起来展开与中国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甚至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来自香港、台湾和各个传教修会的专家，尤其是来自梵蒂冈的专家组成，旨在寻求与中国对话的途径。他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发表了《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尽管这封信是在2004-2005年间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领导的团队撰写的，正是由于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努力，此信才于2007年6月得以发布。可以说，这封信是教会中正式建议与中国进行公开对话最重要的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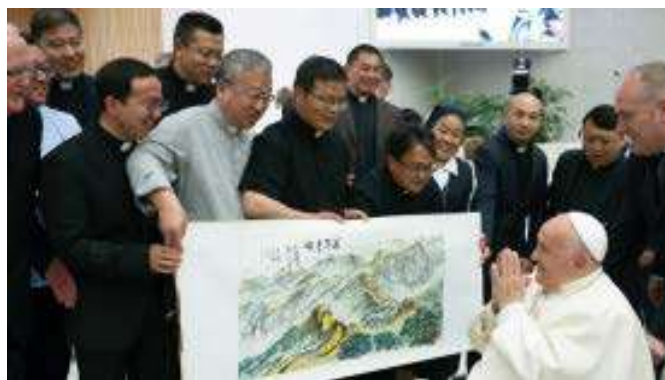


教宗本笃十六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的不懈努力下，方济各教宗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可以被看作，它是始于教宗保禄六世策略的一个高峰，尽管中梵双方还存在着很多分歧。该协议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首先，教会内部还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难以接受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的人，仍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能够跟上教宗的步伐。然而，中国也需要时间。无论如何，

能够展开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一种进步。

作为比利时信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全力支持罗马圣座所做的工作。圣母圣心会于 1982-1983 年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并赞助了 22 年。之后，丹尼尔斯枢机接管了该基金会，并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中国朝圣之旅，以促进对话。直到 2024 年 6 月，德凯瑟 (De Kesel) 枢机和圣母圣心会总会长福古达 (Charles Phukuta) 神父也到中国参观朝圣，他们的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并访问了内蒙古圣母圣心会以前的传教区。



教宗方济各收到南怀仁基金会 2024 年参加春季交流活动中国神父的礼物

促进与中国的对话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必须克服过去几个世纪中产生的误解和偏见，这些误解和偏见主要与政治形态有关，但也涉及教会的立场。教宗方济各和他的前任一样对此看得很清楚。南怀仁基金会希望通过传递有关中国与普世教会之间日益增多对话的客观信息，以及对教宗方济各的对话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做出贡献。通过这种方式，南怀仁基金会将延续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及其创始人南怀义神父 (Theophile Verbist.) 在中国的福传事业。

梵蒂冈与中国延长任命主教协议

Cindy Woode, 天亚社



教宗方济各

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宣布，双方将续签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并将其有效期从两年延长至四年。据香港《英文虎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坚于 10 月 22 日在北京对记者说：“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决定将协议再延长四年”。中方发言人表示：“双方将本着建设性精神保持对话，继续推动中梵关系改善。”

数小时后，梵蒂冈发表声明称：“鉴于就有效实施《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达成的共识，教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磋商和评估后，同意将其有效期从即日起延长四年。”

声明表示：“有鉴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造福中国天主教会和全体中国人民，梵蒂冈将继续致力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

梵蒂冈和中国政府于 2018 年签署了一项协议，概述了确保中国天主教团体选出的天主教主教在祝圣或就职前得到教宗批准的程序。这份临时协议从未被公布过，并在 2020 年和 2022 年分别续签了两年。在梵蒂冈首次签署协议时，教宗方济各也解除了七位经政府批准但未获梵蒂冈同意祝圣的主教的绝罚或非正常地位。这标志着数十年来中国所有天主教主教首次与教宗完全共融。

9 月中旬，教宗方济各对与他一起从新加坡飞返罗马的记者表示：“我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结果很好。此外，在主教提名方面，工作正在善意地推进。”

然而，在过去六年中，梵蒂冈至少有两次对中国任命或调动主教明显违反协议的行为表示不满。

就在梵蒂冈与中国宣布续签协议的前几天，《梵蒂冈新闻报》刊登了两位中国大陆主教在世界主教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并指出直至 2018 年协议签署后，中国大陆的主教才可以参加梵蒂冈的世界主教会议。

两位中国大陆主教代表之一，闽东福宁教区詹思禄主教是 2018 年中梵协议签署后接纳为“与教会完全共融”的七名神职人员之一。他和其他四名神父于 2000 年在未经梵蒂冈批准的情况下被祝圣为主教。（2024 年 10 月 22 日）

第十五届南怀仁国际学术论坛主题 “世俗化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

梵蒂冈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关系部门秘书：Paul R. Gallagher）总主教

第十五届南怀仁国际学术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举行，讨论的主题是“世俗化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依据德凯瑟枢机（De Kesel）的著作。邀请东西方的学者发表了他们在各自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对这一主题的看法和经验。由于南怀仁基金会始终注重中国的对话，因此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已出版，并邀请了一位中国主教和一位中国传教士就此主题发表论文。

以下是来自不同背景演讲者的论文摘要，南怀仁基金会和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特别高兴和荣幸地邀请到梵蒂冈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关系部门秘书保禄·加拉格尔（Paul R. Gallagher）总主教，并作了主题演讲。

保禄 - 加拉格尔（Paul R. Gallagher）总主教的演讲内容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

我非常高兴在鲁汶大学召开“教会与社会”国际论坛之际，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这次会议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要主题。感谢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邀请我就这一主题发表一些简短的看法。

你们此次会议旨在探讨当代教会中一些最现实的问题：世俗化、信友团体与更广泛社会之间的关系、福传与信仰本地化。在反思这些问题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教宗圣保禄六世在其任职期间的首批通谕之一《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提供的宝贵指导。



Paul R. Gallagher）总主教

当时和如今一样，关于教会与世界关系的辩论是基于对这两种现实之间区别的清晰认识：“教会固然与世界有别，然而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完全隔离，也并不表示对世界漠不关心，也不表示畏惧，也不表示蔑视。因为教会虽与人类有所区别，但却并不与之相反，甚至可说与之密合无间。（……）因为教会接受了天主的救恩，故她既对那些亲近的人，又对那些疏远而凡能接近的人，表示出赤诚的仁心和热烈的爱情，并勉力使人人都有救恩的份儿“《保禄六世，祂的教会，63》。

尤其是，《祂的教会》通谕是第一份赋予神学意义使用“对话”这一概念的训导文件：“圣教会应当与其本身生活于内的人类社会会谈，在对话中，她本身就以语言，讯息和会谈的形式出现。”《祂的教会，65》。我相信，这份文件中提出的反思，今天仍然清晰地赋予了基督信徒的重要使命，并与教宗方济各的教导保持一致，因为他已将对话作为他训导的基石之一。

教宗保禄六世坚信“对话应视为善尽传教使命的方式，是联系人心的工具（同上，81）。然而，这种对话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特质，以确保启示的真理以适当的形式呈现，并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对话必须遵循清晰、柔和、慎重、相信天主圣言的效力以及对话者的善意等规则。通过同理心与信任，努力重建教会与世界交流的同时，教宗保禄六世还发出警告：“就如当初宗徒们在克尽其职的时候，四处身临危境。与兄弟固应有携手合作的热望，但绝不能放弃真理，或在真理上让步，我们的对

话无论如何不能在坚守信德的原则上稍有松懈。（同上，88）。

我认为《祂的教会》通谕在本次国际会议探讨的许多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教宗保禄六世所定义的对话为教会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框架，同时也成为塑造教会内部关系以及整合不同风格和情操的重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具有杰出文化传统和最现代的中国对话，以及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对话，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效和发展前景的领域。

教宗方济各追随其前任的脚步，不断提醒重建教会与世界、社会与社会、不同身份之间这一关系的艰巨工作迫在眉睫。由此展现出的形象是，一个传教士教会的形象，在没有反对或排斥的情况下，踏上世界之路，谦卑的宣扬福音。

构建一个忠于信仰并不断皈依的教会，将自己重新交托于基督，作为希望的标记和喜乐的种子奉献给世界。我将这幅图像作为我对所有参与本届国际会议者的美好祝愿，希望你们的工作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并恳求上主祝福你们平安喜乐！（2023年8月19日，罗马）

以隐修士的视角，在默观中审视世俗社会

Dom Bernardus Peeters osb

您让我谈谈作为隐修士对教会和世界的看法，这确实有些冒险。因为一个为了天国而远离尘世的人，真的适合探讨在俗社会中信仰和宗教的话题吗？我的第一反应就像第三和第四世纪、第一批基督徒——沙漠教父和隐修会的修女退居沙漠一样。然而，这些沙漠教父教导我，为了荣耀上主的名，我既要逃离人群，也要为了光荣主的名去拥抱身边的人¹。

尽管我在爱天主与爱近人之间的张力中生活，我还是接受了你们的邀请，因为我深信，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审视和对待在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从而产生一种激发信任和希望的灵感：默观。教宗曾说：“默观就是在每件事和每个人身上看到天主。为此，人们需要拥有‘信仰的目光’。”这种默观非常奇妙，它不会让我们变得幼稚，反而使我们更加人性化！

默观包含了爱主爱人，只有远离外界干扰，我们才能在万事万物中看到并荣耀上主。关于与世俗保持必要距离（与世隔离），我始终受到意大利裔德国神学家罗马诺·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 1883-1968年）的思想启发。这种隔离并非简单的疏离，而是始终在这张力中找到平衡。

1967年，教宗保禄六世邀请包括多玛斯·牟顿（Thomas Merton）在内的一些隐修会士，为第一届主教会议的与会者写一份关于默观的资料。牟顿心情不爽，因为他感到教宗似乎期待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答案或特别的信息，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优秀、更高尚或更具智慧。牟顿称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即使在独修中，他也会回应当代人们的疑问，并与乐者同乐，与忧者同忧。他认为深思默观是一种特殊使命。对牟顿而言，“天主选择临在于世界，把自己显示给人类”。这是牟顿的默观灵修，我希望也成为我的沉思默想。

1. 默观之爱（牟顿在 Louisville 的经验）

德凯瑟（Jozef Cardinal De Kesel）枢机在其著作《世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中指出：“我

¹ Arsenius 34。



本笃会总会长
Dom Bernardus Peeters
在南怀仁第十五届国际论坛中演讲

们从经验中深知：爱与团结赋予了我們生活的意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世俗社会中，对爱的理解存在一定共识，尽管衡量标准可能各异。除了这些差异，爱与真理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但许多身处世俗文化中的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对许多人而言，爱是一种纯粹的情感，可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然而，从宗教的视角来看，爱与真理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联系。在默观中，这意味着在爱中寻求真理，或在真理中寻求爱。

2. 默观中的博爱（提比里隐修士 — Tibherine, 热情好客的殉道者）

让我们搭乘第二艘船——默观中的博爱。正如牟顿所言，在默观中，我们能够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天主的临在，并建立兄弟情谊。天堂之门为每个人敞开。谁也未曾想到，1996年，这扇天堂之门竟然会在阿尔及利亚的阿特拉斯山脉的提比里熙笃会小团体中突然打开。

1971年，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de Chergé）的年轻人来到提比里隐修院。因为在他服役期间，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穆罕默德（Mohammed）曾救了他一命。为回报阿尔及利亚人民，克里斯蒂安决定在阿尔及利亚的这片土地上把自己奉献给上主，希望与提比里的弟兄们在这座山上成为基督徒与穆斯林合一的标记。他们用“祈祷者中的祈祷者”这一美好词句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忽视当地人，而是通过祈祷劳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和兄弟情。当地的清真寺被烧毁时，隐修士们将教堂的后院腾出作为临时清真寺。他们还创立了“和平纽带”，一个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组成的团体，每月在隐修院聚会一次，一起祈祷、默想，并探讨各自传统中的特定主题。克里斯蒂安于1975年9月21日，与穆斯林一起祈祷时的神秘经历，最能体现这种默观中的兄弟情谊。

如果我们希望以全新的和信仰的视角来看待教会与世界，就必须敢于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只有远离世俗，我们才能以基督的眼光和立场审视教会和世界。这种默观的挑战不在于距离，而在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这不仅关乎我们对上主的爱，也关乎我们对邻人的爱，而同时兼顾这两者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平衡需要我们不断去寻找，而保持静默是至关重要的。顺便提一下，在我们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并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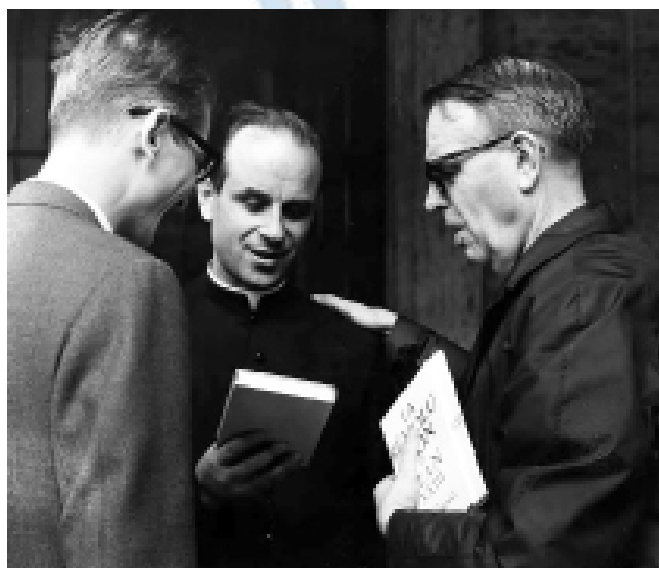
从中国基督化到与中国及其人民对话

圣母圣心会，南怀仁基金会创办人兼董事：韩德力神父

引言：世俗化社会已显而易见，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在我65年的中国传教生涯中，我逐渐认识到与中国这个世俗化社会对话的重要性。对话本身是福传道路上的第一步，他更新了我福传工作的态度，并让我的传教士圣召越发变得成熟。

1957年，我怀着传扬福音的使命，作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前往中国台湾，希望能给更多中国人付洗，为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然而，到了1950年代，我们这些中国传教士逐渐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思考并更新我们的目标，从“中国基督化”转变为“与中国对话”。这一转变不仅符合时代的需求，而且更加坚定了我们福传使命。



M. D. Chenu(右边)在梵二大公会议期间

第一部分：

1983年，圣母圣心会决定成立南怀仁基金会，旨在促进与中国对话。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教会的对手，甚至是敌人。如何与敌人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40年来，这一直是南怀仁基金会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名中国传教士，我必须了解并经历了一段艰难痛苦的时期，值得欣慰的是，我的福传使命变得越来越成熟。首先，我必须将自己从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思维中解放出来，这种思维是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从教会领受的传统思想，我视它们既神圣又珍贵，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其传统思想有了质疑。其次，我必须学会接纳中国，将其视为对话的伙伴，当然，我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8、9岁时，我们认为自己是“圣体军”“自豪的战士”，高唱着“基督，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军队手持十字架为你冲锋陷阵，直到我们最终获得胜利”。当我们还是青少年时，就宣誓要忠于教会。这种为基督征服世界的精神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非常强烈。这或许是促使我于1950年加入圣母圣心会，成为一名中国传教士的原因。

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梵二大公会议之前，我在鲁汶圣母圣心会修院学习神学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所学的神学思想受到了 M-Dominique Chenu OP (1895-1990)、Yves Congar OP (1904-1995)、Gerard Philips (1899-1972) 和 Albert Dondeyne (1901-1985) 等神学家的启发，打开了我们幼小的心灵，让我们思考“信仰与世界”、“真理与自由”等问题。这拓宽了我封闭的信仰视角，促使我更多地了解中国人和亚洲人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和印度教。我读了根特大学 Poussain de la Vallée 写的关于佛教的书，对其内容印象深刻。当我读到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 (Debendranath Tagore 1817-1905)、所写的《上主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God》一书时，让我深受感动。他的信仰与我的如出一辙，它不仅没有削弱我的信仰，反而丰富了我的信仰，但我的传统天主教思想依然存在。自1957年起，我在台湾传教的第一个七年里，我的中文弥撒讲道和我对慕道者讲的道理，仍然以使中国基督化为目标。

有两件事让我逐渐意识到向中国福传的新视角：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梵二大公会议和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开放政策。

1964年至1966年，我在巴黎天主教学校学习牧灵神学，在长达两年的强化学习期间，我接触了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教会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信仰自由》、《祂的教会》等。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在台北牧灵中心所教授的培育课程。它为我创造了真正的空间，使我能够尊重并对其他信仰和文化保持开放。梵二精神结束了我想把中国变成基督徒国家的旧目标。



邓小平接见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1974年鲁汶举办的国际中国会议，王守礼（圣母圣心会），万广礼（圣母圣心会），Jan Kerkhofs（耶稣会）和其他成员参加了会议

第二部分

梵二会议和圣母圣心会的长上鼓励南怀仁特基金会与中国进行对话。但教会还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教会没有，台湾和香港教会更没有，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教会的头号敌人。要使天主教信友与中国对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改变教会中的固有思维。南怀仁基金会的经验是，许多反对与中国对话的人也反对梵二会议。

1980年12月，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教宗，有人向教宗介绍我是圣母圣心会在中国的传教士，致力于促进与中国对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教宗听到“中国”这个词时，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马上对我说：“神父，你是一位会讲中文的中国传教士，请前往中国，与教会中的每一个人交谈，听听中国国内教友和主教们的声音，回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希望更好的了解他们的情况，更需要他们的建议。”我们都知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背景，他竟然会寻求如何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建议，真是令人惊讶不已。我的疑虑很快得以澄清。

1982年10月，在纪念利玛窦的活动中，教宗望·保禄二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对“与中国对话”的看法，他公开指出：“我们应该与中国当局沟通，通过对话消除过去所有的误解。”此番演讲使南怀仁基金会备受鼓舞。但是，普世教会团体有反对与中国对话的，甚至中国内部反对对话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因此，文化大革命后不久，推动中国与圣座（帝国主义的梵蒂冈）之间的对话是不可想象的。要做到这一点，南怀仁基金会需要找到具有“求同存异”开放精神的中国教会领导和政府官员。在创办南怀仁基金会之前，我必须做到这一点。

南怀仁基金会需要尽其所能找到更多的支持，否则就会功亏一篑。1981至1982年，是我一生中寻求支持中国对话付出最多，且最辛苦的一年。我认识了台北的罗光总主教，他当时是辅仁大学（台北）的校长，很有远见，也是一位学者和忠于教会的牧人。他非常了解真正“与中国对话”的历史重要性，并举办了一次台北和香港专家出席会议，我们大家都明显受到了来自香港新教和天主教学者以及鲁汶会议思想的影响。所有人都建议与鲁汶大学合作成立南怀仁基金会，最终在台北辅仁大学为与中国的交流和对话打开了大门，这是南怀仁基金会创办时获得支持关键性的第一步。

我与中国教会领导和中国学术界学者的交流始于1981年10月，在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中国会议期间，接触了60位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包括主教和神父，会议探讨了同一个问题，称之为“一个新的开始”。我很幸运地受到了会议主席、著名的中国新教进步派南京圣公会丁光训主教的邀请。这次会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多参会者都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和体会中国共产主义。再就是1982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期间，参访了教会内外各界人士。

为了得到中国人的建议，我与北京（非法和官方）主教傅铁山和赵复三教授（前任圣公会



罗光总主教与教宗保禄六世

牧师) 在一个房间交谈了几个小时。当时, 赵复三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们说话直截了当, 但并不咄咄逼人, 从他们的话语中, 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信仰的执着。但对我而言, 他们的基督信仰是来自一个我根本不了解的社会: 一个世俗化、强权执政的无神论社会。我越听越感觉自己必须吸收新的观点。赵复三教授的话极致地概括了一位、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基督徒的真诚建议。他说: “神父,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科学、农业、技术、经济。国家理所当然会把重点放在发展科学和技术, 因为这是中国迫切需要的。但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公民, 我想知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人们需要什么’? 你们比利时的欧洲教会, 可以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做出基督徒应有的贡献。我建议你们不要打着传教修会的旗号来中国, 而是与鲁汶大学一起合作与交流”。在蒙特利尔获得的建议消除了我对创办南怀仁基金会的疑虑和担忧。1983年, 圣母圣心会批准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 以协助圣母圣心会促进与中国的对话。

早在1985年, 由鲁汶大学校长 Piet De Somer 邀请, 第一届北京天主教友好代表团对比利时鲁汶大学和各教区进行了为期13天的访问。参访者是官方非法主教(不是教宗任命的)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此次访问由南怀仁基金会组织, 丹尼尔斯枢机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并进行友好交流。当时对话很困难, 没有批评, 也没有实际性的交流。对话是通过握手、交换礼物、共进晚餐来表达, 最重要的是在祈祷中的共融。这是第一次中国“非法主教”与教宗的顾问开展对话, 也是对话之路漫长朝圣的开始。

代表团还参访了圣母圣心会母院, 并受到了圣母圣心会中国老传教士们热情接待, 其中一些老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三四十年, 后来被驱逐出境, 并被指控为“帝国主义”, 有的传教士坐监数年。老传教士得知来访的消息后有些困惑, 但还是决定好好接待来访者, 他们询问了内蒙古教友们在文革后如何重新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最感人的是大家同声用拉丁文唱《天主经》和《圣母经》。这是对话、治愈与和好的时刻。

南怀仁基金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机构, 主张与无神论、不同哲学和宗教进行对话,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相互理解, 同时在现代世俗化社会中追求进步和福祉。南怀仁基金会寻求与中国求同存异, 发现与中国作为对话伙伴所认同的观点, 在不认同的问题上相互尊重。这就是南怀仁基金会对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社会的态度。南怀仁基金会的对话优先方案是一场持之以恒的斗争, 既要获得朋友们的支持, 又要面对其他人的公开反对。一些台湾朋友, 多年来在牧灵复兴方面的亲密朋友与合作者, 自从我访问中国的那一刻起就不再与我联系。在他们看来, 我是“亲共者。”

然而, 中国官方当局并不同意我与非官方(地下)天主教团体接触。他们视我为“渗透者”, 我两次被软禁, 并被审讯了几十个小时。我每次访问中国, 都要与政府当局包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人士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谈话, 旨在寻求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友好交流。虽然海外的一些重要教会领导公开而激烈地批评这些做法, 但圣座的朋友私下告诉我: “请继续努力, 你是唯一一个这样做并取得积极成果的人!”

圣座本身也采取了促进对话的举措。其中之一就是《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信徒的牧函》。这封牧函建议与中国教会和政府当局进行对话, 这可被视为中梵关系中最重要文件之一。教宗本笃十六成立了“梵蒂冈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 我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教宗亲自参加了每年为期三天的会议中的一次会议, 并亲自见证了一些委员会成员支持教宗建议的对话, 而一些成员则强烈反对。

2004年, 南怀仁基金会深受重创。圣母圣心会的高层长上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 旨在促进与中国的对话, 圣母圣心会赞助和指导基金会长达20年之久, 但后来由于反对对话的批评, 圣母圣心会欠考虑的决定中止对基金会的赞助和指导, 这意味着南怀仁基金会的终结。基金会只能靠自己, 被迫寻找另外一个有兴趣的教会实体接替圣母圣心会。南怀仁基金会在危机中, 不屈不挠的又度

过了 20 年，基金会将这段经历视为在对话道路上走向成熟的必要时期。

我以南怀仁基金会主任的身份，访问了整个中国北方的学术机构和教会团体。在我中国之行和访问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教会不再需要外国传教士传福音，并且找到了传教士使命中新的福传态度。

我与中国教友、神父和主教们交谈，聆听他们如何在中国新的社会主义、无神论和世俗化的社会中，关于对信仰生活的疑惑和挣扎。我只能给他们一些笼统的反馈，但他们对此却感到宽慰。我过去的传教目标是传福音，使中国基督化，而现在的目标是“坚固你弟兄的信仰”（路 22, 33），福传内容与过去一样。但是，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福传态度：聆听、交流，发展在新中国建立本地自治教会的新态度。在无神论的中国政府任命的官方主教（不是教宗任命的主教），以及神父和教友们对我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中，使我产生了这种新的态度。只有走进中国国内教会，才能获得这些新的福传见解。



1985 年，参访圣母圣心会母院

结论

南怀仁基金会希望继续与创立基金会的圣母圣心会团结一致，并汲取传教士们的灵修。它作为一个机构，需要在普世教会内扎根。只有这样，基金会才能在不放弃传福音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适应时代的要求，以“与中国对话”来取代使“中国基督化”的旧目标。

今天，南怀仁基金会呼吁低地国家的地方教会继续支持南怀仁基金会，跟随教宗方济各的脚步，促进与中国的对话，因为在当今世俗化的社会中，如果没有教会的全力支持，南怀仁基金会将无法生存。

教会与社会

南怀仁研究中心国际学术论坛——闭幕致辞

德凯瑟枢机

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

在闭幕词中，我不想回顾本次国际会议的所有演讲内容，也不想做出任何结论，我只想在会议结束时澄清几件事。

本次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讨论我的书，而是在我写的内容上，进一步思考今日教会和基督信仰在中国及西方的处境，反思如何应对世俗化社会的挑战，如何传福音，探讨普世教会的使命与本地化，尤其是思考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并未考虑到中国教会的境况。但南怀仁基金会的



德凯瑟枢机与多玛斯蒙席（Tomáš Halík）谈话

工作人员让我意识到，我的思想和福音的传播对中国教会并非毫无关联。尤其是我把基督宗教视为一种文化宗教来论述，如此对于理解教会的立场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坚信教会不应再追求这种文化宗教的位置，无论是在世俗化社会中，还是其他任何情境中都不应如此。

在大会期间，大家对世俗化和福传进入了深入思考。特别多次提到具有启发性的梵二大公会议的文献，特别是教宗保禄六世在《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中的内容。梵二大公会议的确在这些问题上有了全新的改变以及方向上的调整。因此，今天人们更加注重对话、基督徒的合一、宗教间的对话以及信仰本地化。即便基督宗教不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宗教，教会的生活和工作始终与当地的文化紧密相连。就像法语说的那样，就其纯粹的状况而言，基督宗教并不存在。在古代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到最近，在西方，人们视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福音也就是在这种不证自明的背景下传播的。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许多人生活在一个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世界，认为宗教不仅无关紧要，难以理解，而且宗教本身完全缺席。人们并不反对宗教，但不知道宗教意味着什么？福音的信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尽管如此，我依然坚信世俗化并不等同于世俗主义。世俗化既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也不是所有问题的起因，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中。我认为在许多教友甚至在教会领导的心目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只要世俗化结束，教会的状况才能恢复正轨。”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问题：“人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基督化的世界，或者，如果不是的话，也不能把它视为是一个尚未成为基督化的世界。因此，福音的宣讲也就相应地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了理解。

正因为如此，尽管存在各种细微的差别，我仍然从根本上将世俗化和世俗文化理解为一种非宗教的，特别是非基督宗教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与其说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恩典。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里，基督宗教一直是一种文化宗教。渐渐地，它开始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理解和表现自己。基督宗教逐渐形成了这种观念：它的使命和圣召就是使世界和社会基督宗教化。而且，教会只有生活和工作在基督宗教化的世界中，教会才能完全实现她的使命，总之，这才是教会的正常状态。如果一些地方尚未基督化，教会就有责任去实现这个目标。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认知，导致了许多困境，甚至严重威胁了教会的公信力。在这种心态下，虽然教会可以友好地对待其他宗教和信仰，但最终仍然会否认和谴责它们。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梵二大公会议之前的反现代主义运动，便是这种思想的痛苦终结。我深信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和《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真正开辟了新天地。教宗方济各的所有目标只有一个：不要偏离这条新路。



2024年10月，杭州主教杨永强在梵蒂冈举行世界主教会议期间与教宗方济各握手。（来源：梵蒂冈媒体。）

正因为如此，正确理解教会和她的使命，以及教会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非常重要。尽管世俗化确实对教会是一大挑战，但它并非对教会的使命造成威胁，或给教会带来巨大危险。恰恰相反！世俗化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恩典，它邀请教会自我更新，首先是要皈依。因为它帮助教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迫使教会不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世俗世界里。重新发现其最初的使命：“教会不是世界，而是作为天主的子民在世界中生活，见证天主对所有的人的爱。

正因如此，圣事（sacrament）的概念对于理解教会在社会中的使命和地位至关重要。教会不是世界，也不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她的使命。教会必须在世界中生存，她不仅仅是单纯地存在，而是要真正地临在，通过她的宣讲（有时不讲话！）、教会内所体现的彼此相爱的精神，以及对任何有需要之人的实际关怀，来见证福音。圣事标记可能很小，甚至看似微不足道，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却是普世性的。教会被召叫去向所有民族、所有受造物宣讲福音，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教宗方济各呼吁教会成为一个更加共议性的教会（synodal Church）。在这点上，他重申了梵二大公会议的最深层意向。共议的意思是“一同前行”。《教会宪章》重申教会首先不是一个有等级制度机构，而是天主的子民。当然，教会中有办公室和服务项目。如果所有人都是主教，那反而会是个问题！然而，在教会中，没有主人，也没有下属。耶稣明确地教导：“在你们中间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你们的师傅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

共议精神不仅适用于教会内部的关系，也适用于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团结的。世界对教会来说不是外来实体，世界是天主的创造物，天主竟这样爱了这个世界，直到今世的终结。因此，教会也必须聆听世界的声音，这才是真正的向世界开放，也正是梵二大公会议所大力倡导的开放。这就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提出的教会革新（aggiornamento）的意义。革新并不是主张尽可能在一切方面适应现代性，而是呼吁教会不要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教会。这正是教宗方济各所呼吁的，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

最后，我想以《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开篇语作为结束，我的书也是以这句话作为结尾的。这将继续成为先知般的话语：“这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尤其是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感受到的，这些也就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和焦虑。确实，任何真正的人性的事务都会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因此，教会团体意识到，她与全人类及其历史存在着最深的纽带。

教宗方济各对比利时的访问，加深了比利时教会与中国教会之间的联系

Andrea Gagliarducci（意大利日报）

意大利记者 Andrea Gagliarducci 随教宗方济各的代表团访问比利时。借此机会，他希望凸显比利时教会与中国教会之间的奇特关系，因此采访了韩德力神父，以下是采访内容，特此呈现给读者：

教宗方济各在 Laeken 皇宫觐见比利时国王时，韩德力神父作为民间社团嘉宾应邀出席。韩德力神父生于 1931 年，是一位活力充沛的传教士，曾于 2008 年至 2013 年担任梵蒂冈中国委员会成员，多次访问中国，并多次安排中国主教访问欧洲。在接受 ACI Stampa 采访时，韩德力神父详述了比利时传教士与中国之间的特殊纽带、中国福传事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仍需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去年，你们接待四位中国主教，而你本人也经常走访中国。请问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如何与中国建立起这层渊源的？这些年来关系又是如何发展的？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于 1865 年抵达中国，并在内蒙古传教长达 90 年，直到 1955 年。他们的福传范围涵盖整个华北，从东到西延绵 3500 公里。是当时中国最落后的地区，没有公路，遍布草原和沙漠。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不仅向汉族和蒙族传福音，还建立了数百所学校和诊所，在呼和浩特创办了一所现代化的大医院。传教士们还利用黄河水修建了长达 700 公里的大小运河，将水引入

农田，灌溉数万公顷的贫瘠土地，将其变成肥沃的良田。从而大大改善了当地贫苦农民的生活。

传教士们那些年都做了什么？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五个大教区和大修院，培养了 250 名中国神父，其中三位成为了主教，从圣母圣心会主教手中接管了教区的行政管理。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北京怀仁学苑，以从事汉蒙文化和语言研究而闻名。虽然他们都是自学成才者，但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备受推崇，中国汉族和蒙古族的学者还在大量引用。圣母圣心会在中国福传 90 年间，共有 679 位比利时和荷兰传教士在中国北方服务，252 人去世后葬于中国北部，其中 88 人死于斑疹伤寒，8 人于 1900 年义和团事件中殉道，12 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期间去世（其中一些人死于狱中）。



圣母圣心会在绥远（呼和浩特）创建的公教医院

传教工作中是否经历过困难时期？

1950 至 1955 年，共有 254 位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生活了 30 到 40 年，甚至更久，有的从未回过一次家。有些传教士在中国监禁了数月，甚至有些在狱中呆了三年后才被驱逐出中国。尽管经历如此曲折，受到教宗保禄二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动与中国对话的激励，圣母圣心会于 1983 年在比利时鲁汶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Verbiest Foundation, VF），旨在协助圣母圣心会与中国教会进行对话，以及与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交流与合作。1982 年，我出任南怀仁基金会主任。2004 年，当我 79 岁时原本打算退休，但因缺乏继任者，我不得不继续工作，直到 2023 年。

您认为自己是与中国对话的真正先驱吗？

推动与中国对话的真正先驱是教宗们。第一位伟大的对话倡导者是教宗保禄六世，在《祂的教会》通谕中展现了这一精神，随后历任教宗都延续了这一对话路线。现任教宗方济各在 2018 年与中国签署了协议，使对话达到了新的顶峰。圣母圣心会通过鲁汶南怀仁基金会紧跟教宗们的指引，首先是教宗保禄二世，然后是教宗本笃十六世（2008 年，教宗本笃十六任命我为罗马教廷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成员（与陈日君枢机一起）），直到现任的方济各教宗。尽管许多人，甚至一些传教修会人士，批评甚至反对教宗方济各与中国的协议时，南怀仁基金会始终都在言行和行动上公开支持该协议（通过与中国教会的积极交流以及南怀仁的出版物）。

您是如何成功推动对话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推动与中国的对话非常困难。许多普世教会人士，甚至台湾和香港的教会都公开反对与中国对话，因为当时中国被视为是教会的头号敌人（尽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反共著称，但他却私下鼓励南怀仁基金会继续努力开展对话，这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然而，中国国内并非所有官员都愿意与教会或罗马教廷进行对话，他们将罗马教廷视为“梵蒂冈帝国主义”。自 1982 年起，我多次访问了中国，我坚持与“官方”和“地下”教会的信友以及领导们会面，因此政府当局对此表示不满。我被视为“渗透者”，并列入了黑名单。在我申请签证时，有时会被拒签，我还曾经曾被逮捕、软禁并接受数小时的审讯。

尽管如此，我仍然努力与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展开正式对话。对话首先意味着既要聆听，也要发言，但应避免咄咄逼人，如此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1985 年 12 月，我是第一位应邀在上海余

山修院授课的外籍神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在中国各大神学院教授神学（有时允许讲课，有时被拒绝……），直到我八十多岁仍继续往返中国。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严密监视，因此，我不仅要与公安部门“密切对话”，还需要与国家安全部门“对话”。在中国几十次访问中，我每次都要与这两个部门进行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对话，这样累计下来有长达数百小时的对话，从中促成了相互理解，甚至建立了友谊。

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

过去 40 年，尽管我曾被正式列入黑名单，但许多中国官员仍我视为朋友，并将南怀仁基金会和圣母圣心会也视为他们的朋友。因此，2023 年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官员主动提出希望我们组织中国主教访问比利时，甚至希望他们不仅访问比利时教会，还能访问“欧洲其他两个国家”，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一个月前，我陪同德凯瑟 (De Kesel) 枢机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随后，我个人又前往台湾两周，因为自 1957 年起，我便作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台湾传教，正式开启了与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所有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团体对话。

您在 40 年前创立了南怀仁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什么？基金会迄今取得了哪些成就？

1981 年，在邓小平开放中国与世界对话和交流三年后，我向第九届圣母圣心会总大会提议，圣母圣心会应积极响应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起的对话倡议（尽管当时普世教会中许多人并不支持与中国的对话）。修会总会批准了这一提案。于是两年后，1982-83 年南怀仁基金会成立了，成为我们 40 多年来推动与中国对话的开端。

40 多年来，南怀仁基金会始终努力寻求教会中少数支持对话的人的支持，同时也受到教会内外许多反对对话人士的批评（至今仍有不少反对声音）。不过，罗马教廷的高层一直鼓励南怀仁基金会继续努力。甚至在“罗马教廷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公开反对对话！尽管目睹了这一切，教宗本笃十六世仍于 2007 年 6 月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我认为这是中梵关系史上教宗公开推动对话的最重要文件。

有好的效果吗？

是的，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南怀仁基金会曾在中国为神父、修女和教友们开设了一系列的培训班，包括教理、牧灵、教会社会伦理与灵修。（这些课程现已转交给中国本地教会，由当地的神父和教友们自己开办）。此外，南怀仁基金会曾在罗马教廷的许可下，两次在比利时为中国主教们举办了关于教区管理的培训。



韩德力神父与鲁汶中国学生觐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2023 年，中国主教参访比利时
De Kesel 枢机和总主教 Luc Terlinden

根据您的经验，与中国对话中还缺少什么？实际的效果有哪些？

1937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发表了《救世主》（*Divini Redemptoris*）通谕，强烈批判了当时斯大林在东欧对教会的打压。今天的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已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不相同，尽管它依旧是无神论，但已不再是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教会中有许多人仍用三十年代的落后思想来看待共产主义。现今的共产党并不信任教会，也不倾向于对话。然而，如果我们公开表达对话的诚意，沟通便有可能。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不会盲目接受对方的所有批评，我们承认教会过去的错误，同时也诚实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尽管大多数共产党人尚未准备好或允许对话，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持开放态度。我认为，共产党内部存在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天主教徒之间的分歧。

在我们的对话中，最缺乏的是聆听的态度，以及勇于承认共产主义者某些观点的正确性。我们需要真诚且准确地表达我们与他们的共识与分歧，更重要的是，愿意推动交流并建立友谊。这一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极大的耐心……，而最关键的，是能够流利地用中文与他们沟通……。

这次中国主教走访比利时并非首次。这些年来，有多少中国主教和学者走访过比利时？情况有何变化？

1985年11月，南怀仁基金会首次组织了中国天主教友好代表团访问比利时。鲁汶大学校长 Piet De Somer 邀请了三名官方主教——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呼和浩特教区王学明总主教、汉阳教区涂世华主教，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刘柏年先生——对比时鲁汶大学和教区进行了为期13天的访问。那时，这些主教们刚刚获得政府许可，重新开放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的神学院，着手培养中国神父。Piet De Somer 校长热情地接待他们参观鲁汶大学和现有的比利时教区神学院，分享了培养神父的方法与经验。

其中两位主教在文革期间曾结婚，且均为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员，因此无法获得教宗保禄二世的批准。这也是为何由鲁汶大学校长 Piet De Somer 而非丹尼尔枢机主教发出邀请的原因。不过，枢机主教仍接见了主教们，就未来的交流与合作展开了对话。这一历史性的举动，受到了东西方一些教会机构的公开批评。然而我们了解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此举动非常关注，并赞成与中国展开对话。

这是南怀仁基金会发出的众多邀请中的第一次（随后的几年里，南怀仁基金会发出约十二次邀请）。Fabiola 王后两次在比利时皇宫热情接待了中国主教们。南怀仁基金会还两次邀请了国家宗局局长及其代表团，带领他们参访比利时司法部，就“比利时和中国的宗教自



2004年中国主教、神父参访根特教区 Luc van Looy 主教



1985年，丹尼尔枢机（Danneels）接见中国主教

由”彼此交换了意见，随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记者可以自由提问。这一切改变了什么？毫无疑问，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官方教会和政府建立互信关系，同时也有利于改善中梵双方更进一步的关系。

教宗访问比利时期间，梵蒂冈可能与中国续签主教任命协议，您如何看待这份协议？协议带来了什么好的成果？

在谈到中梵协议取得的“成果”时，人们必须首先清楚地认识到鸦片战争（1841年）期间和之后的中欧关系，以及中国在反抗这场战争中如何看待天主教？罗马教廷在签署协议之前走了很长的路。直到2018年才实现此目标。可以说是一项重大成就。在最初几年里，我们慢慢意识到该协议并没有很快为罗马教廷带来预期的结果。批评协议的人层见叠出，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似乎看不到好的效果。但最近的迹象清楚地表明，罗马教廷谈判人员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罗马教廷和北京共同连续任命了多位主教，一些地下主教加入了官方教会，可以说这是中梵协议取得的重大突破。多年来，我个人一直以钦佩的目光关注着梵蒂冈首席谈判代表帕罗林枢机和切利总主教的耐心与技巧。从中国国内，我了解到中国当局非常钦佩他们的谈判态度。我希望梵蒂冈谈判代表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与耐心，罗马教廷在香港的“办公室”很快迁往北京，此举将大大促进罗马教廷与中国的沟通。

我深深地意识到，20年甚至30年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未来期望很高，他们自认为可以公开地参与中国境内的牧灵活动，到神学院教学等。现在，所有期望都破灭了。在我看来，就目前状况，罗马教廷正在尽其所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您如何看待中梵关系的未来？

展望中梵关系的未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梵关系的先驱教宗保禄六世在历史中所做的贡献，他在1970年对香港的历史性短暂访问，和同年对罗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访问中所做的贡献。（当时，他在台湾官方代表面前，恳请联合国粮农组织派出一位中国代表……）。从那时起，在历任教宗的领导下，中梵关系在缓慢而稳定地向好的方向不断推进。教宗方济各的协议将中梵关系推向了一个高峰。我相信，这个高峰会蒸蒸日上。

中国是当今最需要福传的国家吗？如果是，为什么？

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显然正在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对教会而言，基于上述原因，中国是教会最重要的“福传国家！”

传教士在中国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传教士和传教学者应该了解中国教会内部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学习中文，只有这样，才能学会充分欣赏和理解中国。除此之外，东西方世界各国传教士，尤其是中国的传教士务必铭记，在各国充斥着世俗化社会中传福音，不是要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在中国世俗化社会中为福音作见证。因为中国也有相对的宗教自由，但不要把我们的福音强加给他们，而是尊重他们接受福音信息的自由。



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参访香港

当西方遇上东方：台北利氏学社

耶稣会：丁立伟神父（Olivier Lardinois）

台北利氏学社（Taipei Ricci Institute, TRI）于1966年由耶稣会甘易逢神父（Yves Raguin）创立，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利氏学社开展了多项活动，如编辑著名的利氏中法词典、汉西综合词典，发行两本期刊：《台北利氏学社年刊》（1966—2005）、《人籁论辨月刊》（2005—2013）。除此之外，利氏学社也定期举办研讨会及出版书籍，内容涵盖东亚宗教及灵修学、甲骨文、中国基督宗教史、台湾历史与当前社会挑战、新儒学、中国伦理与政治学、台湾历史与南岛民族、中国文学与艺术等各方面领域。

2014年，台北利氏学社缩小了运作规模，部分丰富的图书馆藏书捐赠给了台湾国家图书馆。去年底，学社再次缩编，搬迁至耕莘文教院内四楼的小型办公室，这导致又一部分藏书被分散，分别捐赠给辅仁大学宗教系及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把甘易逢神父及雷焕章神父（Jean Lefevre）的各类手稿转移至法国耶稣会档案馆，方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查找资料。

目前，台北利氏学社专注于编辑与出版中国基督宗教历史书籍，特别是关于耶稣会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帝制时期、及十九世纪后在中国与台湾的传教史。如去年出版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所撰之《天主实录》为底稿，并由广东中山大学哲学系王慧宇副教授加以详细注释的《天主实录今注》。今年，学社另计划发行两套英文新书：

1. 耶稣会士沈起元神父（Fernando Mateos, 1920-2015）撰写的 *China Jesuits in East Asia 1948 - 1968*，中译为《东亚中华耶稣会会士 1948-1968》。本书一套六册，并由雷敦稣神父（Edmund Ryden）针对全书详细编辑校对。

2. 耶稣会丁立伟神父于2022年5月成功通过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答辩的论文：《多面性基督宗教在台湾南岛民族的体现：新竹县山区部落及都市小区的泰雅族基督徒之神学观与信仰实践的比较研究》。

目前，台北利氏学社正和由法籍耶稣会士管理的巴黎利氏学社一同筹组“Who is God? What is the Dao - 神是谁？道为何？”国际研讨会，订于2025年5月8、9、10日于国家图书馆召开，届时将集聚当代犹太教、基督宗教与道教学家共同展开讨论。除了上述两个利氏学社，另有四个学术机构合作举办：台北辅仁圣博敏神学院、巴黎耶稣会神哲学院、国立政治大学宗教学系及天主教辅仁大学宗教学系。



《东亚中华耶稣会会士 1948-1968》丛书



耶稣会丁立伟神父在利氏学社

荷语传教士汉学家及其被遗忘的荷语汉学著作

— 南怀仁研究中心开展的传教士汉学家研究课题 —

郑永君

汉学，顾名思义，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该学科涵盖了多种领域，从语言到文化，历史，宗教，可谓多种多样。虽然早在十三世纪中国已被描绘记录在欧洲人的笔下，然而汉学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它的诞生则相对较晚，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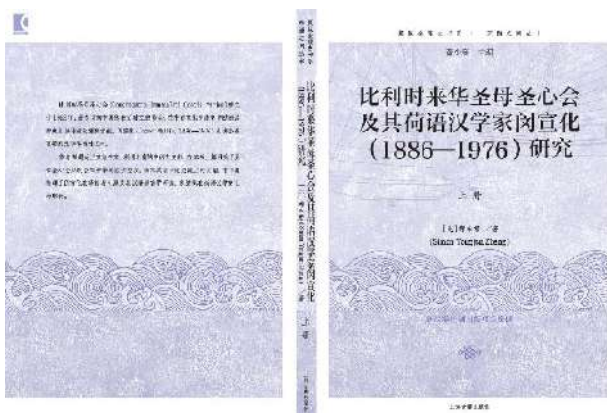
1814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在法兰西学院被委任执掌“汉语与鞞鞞——满语语言与文学”教席，使其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毋庸置疑，雷氏关于汉学研究的大量著述，让他在学术界名噪一时，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可。但实际上，雷慕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象牙塔型学者，因他从未踏上中国大地半步。他所有对汉学的认识以及获取的文献资料皆来自那些为中国献身而勤奋耕耘的实地考察者，即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们。如今，学者们通常把传教士统称为“传教士汉学家”，且他们对这片远东大国的各种研究成果，也通常被冠为“传教士汉学”。

在众多传教士汉学家中，十七世纪来华并在清廷服务的数名早期耶稣会士无疑是先锋人物。他们的汉学著作在中西学界得到了很高的重视，直到如今还有不少学者对这些成果作以细致的考察。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大批西方传教士也随之涌入这座古老的帝国，在教廷委派下在不同的代牧区里服务。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传教士汉学与在欧洲刚刚起步的学院式汉学并驾齐驱，开始茁壮成长。

但值得遗憾的是，来自荷兰和比利时弗拉芒大省的以荷语为母语的传教士的大量汉学著作，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全面地研究。不夸张地说，他们为我们留下的中国史料、档案、文献极为丰富，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真正地发现和挖掘。或许，在解析这些中荷双语文献，特别是处理大量手写材料时出现的语言障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近日，我在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鲁汶汉学研究”（Leuven Chinese Studies）系列丛书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汉学研究上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cheut Missionaries to Sinological Studies）的文章。全文共三十余页，在内容上大致梳理了这个以比利时弗拉芒传教士为主的传教团体，他们在汉学研究领域上的一个整体面貌。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唤醒中西学术同仁能够正视弗拉芒人士在汉学研究上取得的非凡成绩，并且同时强调，出自他们笔下的这些汉学著作和第一手文献资料绝非水平低下，与那些知名的在华耶稣会，遣使会传教士撰写的法文作品以及新教传教士撰写的英文作品是可以平分秋色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院开始，一直致力于研究传教士汉学，特别是低地国传教士汉学的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其学术丛书“鲁汶汉学研究”，目



郑博士即将出版关于圣母圣心会中国传教士闵宣化（Mullie）的研究著作。（复旦大学出版）



1948年圣母圣心会神父们正在学中文



圣母圣心会神父们穿着中国服装

前已达四十多部。作为该中心的全职研究员，我现在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对闵宣化（Jozef Mullie）的深入考证。闵氏是比利时弗拉芒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和汉学家，在教会内部和社会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尊崇。这项“闵宣化研究”主要含有三个部分。即考察闵宣化作为在华传教士和汉学学者的生平，他的两部用荷兰语撰写的汉语语言学著作，以及他在中国匿名撰写的大量刊登在弗拉芒报刊上的时事性报道。

我对闵宣化研究的兴趣实际上始于我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闵宣化的《中国语初范》为研究对象，这是一本用荷兰文撰写的北京以北方言的语法书，共有五百多页。毕业后，闵宣化的汉学研究以及圣母圣心会在华的这段历史持续不断的吸引着我，因此我下定决心继续深造，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来攻读博士学位。在2021年我提交了我的博士论文，很荣幸，这篇名为“比利时来华圣母圣心会及其荷语汉学家闵宣化研究”得到了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认可，不久将以“复旦全球史书系·东西之间丛书”的形式出版问世。该书也是这部丛书首次推出的四本著作中的一本。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博士论文仅仅只是深入开展对荷语传教士汉学研究这一领域的起始点。当对闵宣化的认识逐步深入后发现，对汉学倾心倾力作出各种贡献的弗拉芒传教士实际上为数不少。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田清波（Antoon Mostaert）、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司礼义（Henri Serruys）和司律义（Paul Serruys）两兄弟等人外，还有更多的是那些鲜为人知的荷语中国通，他们的著作对当今汉学研究有着同样的学术价值。比如，贺歌南（Jozef Van Hecken）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圣母圣心会在华北地区的传教史，但出版后仅限在修会内部发行；何云树（Eugeen Grossé）在1930年出版了一部“华尼词典”，它是历史上第一部汉语官话和荷兰语的双语词典，但这部作品毁于一场洪水，如今只有几本存世；还有吕登岸（Jozef Rutten）极富创造力的“方言际辣体汉字”。借此发明，吕氏试图以一套统一的拉丁字母拼写系统来撰写分布在全中国各地的不同方言以及古代汉语的复杂发音。

除此之外，我在上文提到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一大批刊载在圣母圣心会年鉴（Missiën van Scheut）中的文章。从1889年起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部年鉴以月刊的方式不间断地在比利时司各特（Scheut）母院和荷兰会院斯帕伦道（Sparrendaal）发行。大量由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书写的文章和信件刊载在这部年鉴中。不管是长是短，这些文字都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皇朝帝国蜕变为一个现代共和体制国家的全过程，因为居住在塞外边疆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们，亲眼见证且设身处地的体验了这一时期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除了这些刊载在年鉴中的资料外，还有更多的是那些存留在档案馆中的日记和往来信件。在这些未发表的文字中，传教士们毫无顾忌地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毫无疑问，这些第一手资料实为获取大量关于近代中国信息的珍贵来源，并且从这些荷语传教士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洞察新旧交替的近代中国、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特有的本地文化。

总之，作为南怀仁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组，我们的目标和责任是尽力避免让这些已经封尘已久的荷语传教士档案再次被忽视，被遗忘。留在我们研究人员眼前的任务是清晰明确的，那就是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精力来发掘、审视、考证和研究这些文献资料，这些来自低地国的中国专家和实地考察者虽被忽视，但他们仍要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的确非同寻常。

传教士们的陵墓，今天向所有人传递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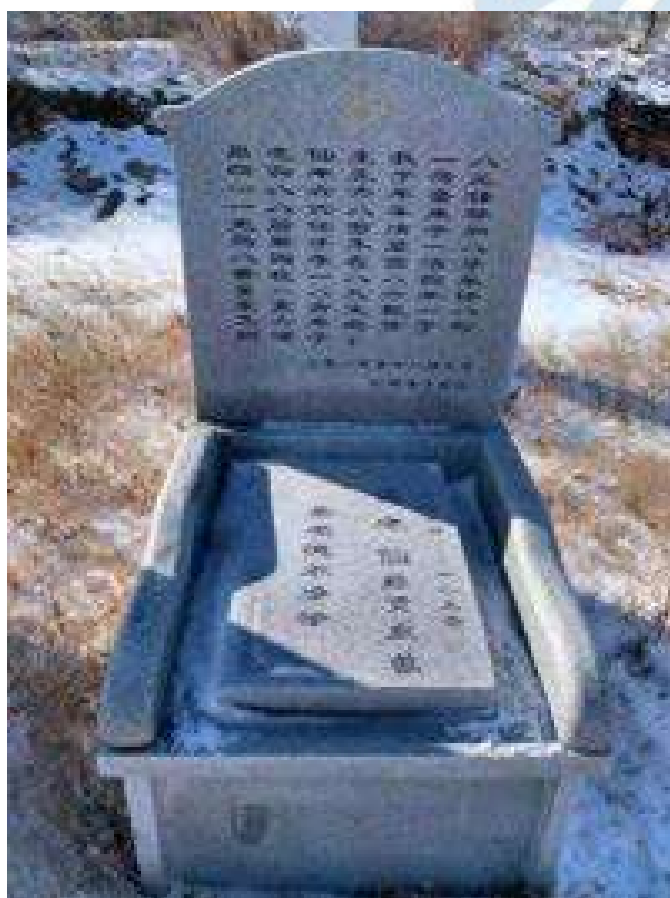
韩德力神父

北京陈欣雨教授撰写了一本 252 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安葬在中国的墓碑书籍。为了收集每个墓碑的历史资料，她花了数年时间，奔波数千公里走遍中国北部。这部 700 页的学术报告详细记录了每块墓碑的信息。为了介绍这本书，陈教授专程从北京参加了鲁汶第十五届南怀仁国际学术论坛。对于比利时、荷兰以及普世教会而言，这 252 块墓碑的信息既有历史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1865 年至 1950 年，679 名比利时和荷兰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中国北方传教。其中 252 人去世后葬于长城以外的沙漠中，他们的墓地分布于多个省份，总长 3500 多公里。这些传教士自由且勇敢地选择离开故乡，来到当时中国最贫困落后的内蒙古地区，与那里的农民同甘共苦，向他们传播福音。为了改善当地穷苦农民的生活，他们为孩子们创办学校，为病人建立诊所，还开凿了数千公里的水渠，灌溉了数万公顷贫瘠的农田。直到 1950 年，传教士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教 90 年后，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者”，对此指控他们始终提出异议。

在政治动荡期间，252 座陵墓曾两次遭到破坏（1900 年和 1960 年）。暴力事件结束后，虔诚的中国基督徒默默地两次收集散落的遗骨，修复了墓地。如今，感谢这些中国基督徒的努力与付出，华北地区 252 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墓地得以保存。尽管没有明言，却发出了响亮而清晰的声音：

“我们过去是朋友，现在仍然是中国北方人民的兄弟。请不要再为政治和分裂我们的事情而争吵！让我们通过对话，在彼此尊重中寻求团结。150 年前我们做到了，为什么今天你们不能继续呢？”



圣母圣心会吕之仙主教之墓（1844-1896 年）



中国主教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我们在共融中

Andrea Tornielli

杨永强主教和詹思禄主教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问候与会者，并反思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与普世教会的共融。

“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一样，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都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中国杭州的主教杨永强（若瑟）几天前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讲了这句话。他是来自中国大陆、出席在梵蒂冈召开会议的两位主教之一，另一位是福建福宁 / 闽东的主教詹思禄（味增爵）。



杨永强主教和詹思禄主教觐见方济各教宗

这是第三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会议：前两次分别是 2018 年以青年为主题的 world 主教会议，以及 2023 年关于同道偕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一期会议。在圣座与中国政府于 2018 年 9 月签署临时协议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大陆的牧人能够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和随后的世界主教会议。

杨永强主教回顾了这几次参与普世教会共融的会议后，解释说：“我们遵循福音精神：‘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的宗旨，积极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坚持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广传福音。中国天主教本著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原则积极与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进行互访。就教会牧灵福传，社会服务，神学研讨等方面进行交流，积极参加国际宗教和平会议和祈祷活动，为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光做盐，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主教最后表示，欢迎各国天主教会和宗教团体到中国教会访问。

詹思禄主教的致词更着重于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他提到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形象和他的“实验”，即“基督福音在人类生活中不同的实践形式”。不过，他接着补充说：“然而，此后就如何分辨文化的差异性与基督信仰的纯正性，一度使得在华传教士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最终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礼仪之争，它的发生地就在我的教区闽东。‘从历史角度来看’，此次挫折原因之一便是教会忽略了人类文化的差异和互补性。”詹思禄主教继续说：“成为福传使命中的共议性教会就是在追寻人类终极目标——天主在旅途中尊重并聆听来自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声音”，在中国教会必须以新的眼光面对问题。主教表示：“如何面对因混合婚姻带来家庭培育的挑战；如何对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适应；如何解决教友在民间信仰与某些传统文化之间的迷茫等都需要中国教会用新目光去审视。新时代的教会赋予新的分辨任务，然而圣神的声音总是隐微难辨的。因此谦卑地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中学习，是福传的重要途径，即以此分辨出‘上主为教会指明新的道路’”。（梵蒂冈新闻：2024 年 10 月 17 日）

北京教区新助理主教——甄雪斌

Marta Zhao

“所行一切皆为福音”。今天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北京教区新任助理主教甄雪斌，在北京主教座堂救世主堂（即北堂）接受任命时，引用了圣保禄宗徒的名言，新助理主教激动地表示，“感恩天主的宠爱，拣选我这个卑微的仆人担任北京教区助理主教。我深知自己不堪胜任，唯以信德服从接受，愿赖圣母玛利亚及圣史玛窦的转祷，全心信赖、全身奉献、恪尽牧职，‘所行一切皆为福音’”。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杨宇神父宣读的落款日期为十月十二日的批准书中写道：“此人选已经教宗同意”。



玛窦·甄雪斌（照片来自中国天主教）

祝圣典礼由北京教区李山主教主礼，四位中国主教襄礼：长治教区丁玲斌主教（新主教家乡的主教）、承德教区郭金才主教、南昌李稣光主教、内蒙古自治区集宁教区姚顺主教。来自全国各教区近 140 位司铎（约 80 位北京教区神父，其余大多来自甄雪斌主教山西家乡的神父）。另有 500 人（修女、平信徒和新主教的亲属）参加了祝圣典礼。

圣座新闻发布中心今天发表的北京助理主教任命中指出，教宗方济各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教宗根据《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批准了甄雪斌的候选人资格，任命他为北京（中国北京市）助理主教”。甄雪斌于 1970 年 5 月 10 日出生于山西长治。1988 年至 1993 年就读于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1993 年至 1997 年继续在美国圣若翰大学深造，这是一所由遣使会神父创立的大学，总部在美国纽约，并获得礼仪硕士学位。1998 年 6 月 25 日晋铎，加入北京教区。1998 年至 2007 年，担任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常务副院长。之后，他在北京的多所堂区开展传教工作。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担任教区秘书长。近年来，他还密切关注北京教区非中国天主教徒的牧灵工作，并参加韩语、英语和菲律宾语弥撒。北京教区共有大约十万名教友、八十多位司铎、四十多所堂区。此外，教区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们也活跃在牧灵福传工作中。（信仰通讯社：10 月 25 日）

正定殉道者——荷兰主教文致和 (Frans Schraven)

安多尼

2024 年 10 月 9 日晚 8 点，正定教区的部分神父，邢台教区的神父，信德室的神父，四位执事，两位修女，以及数百教友齐聚正定，为文致和主教以及八位殉道同伴，举行了感恩祭，为主教的封圣祈祷，今年有许多朝圣团来正定参访。

1937 年 10 月 9 日，日军攻陷正定城，文致和主教保护了约 4000 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日军在城里大肆掠夺，杀戮和强奸，甚至要求文致和主教交出一些妇女作为“慰安妇”，即充当性奴。主教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正定沦陷的当天傍



在正定教堂院子，文致和主教台像前祈祷



正定教堂内部



文致和主教与八位传教士被杀害在正定天宁寺

晚，文致和主教和八名神父被捕，随后被卡车带走。当晚，日军在河北正定、距一座数百年历史的佛塔不远处遇难。直到1973年，人们才发现文致和主教与八位传教士是被活活烧死。正定教区的神父教友们把主教的殉道事迹告诉更多的中国人，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主教对中国人的爱，和他对中国教会做出的贡献，并希望将遣使会的精神继续在正定传递，祈求主教早日封圣！我们也愿意与他在荷兰的家人们共享主教封圣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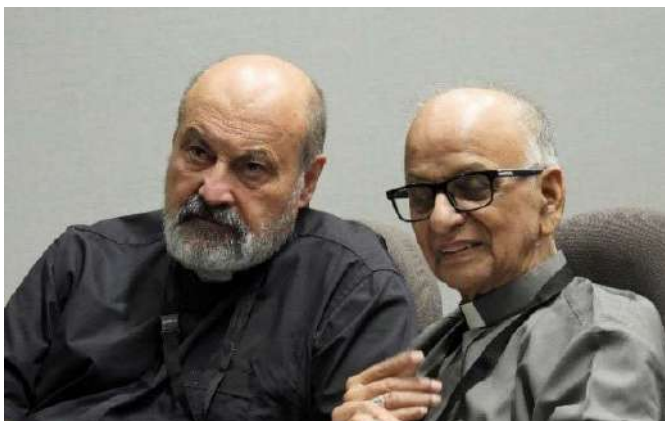
教友们不仅会在主教殉道日纪念他，正定堂区的教友每周都有人去天宁寺主教的墓碑前祈祷，扫墓。近年来，来访正定的人逐渐增多，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团体，也有个人，我们向他们讲述主教的光荣事迹。由于历史原因，文致和主教的殉道事迹时隔多年才被提出（1947年正定的陈志明主教带领几乎全教区的神父们到了巴西，再没回国，导致正定教区至今仍在艰难前行……），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努力宣传文致和主教坚持正义和维护妇女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并为他的封圣祈祷！我们与荷兰教会一起祈祷，共同见证主的福音。正定教堂正在建造新房子，以展示文致和主教对中国人民的爱心事迹。院子会以主教的名字命名“致和院”。中国教友们期待它早日完工。我也期望能亲赴现场参加主教的封圣典礼！



弥撒结束后，中国神父
在正定天宁寺文致和主教纪念碑前

第十五届南怀仁国际学术论坛

在本期的《懷仁之驛》期刊中，您会看到有关我们第十五届国际学术论坛的更多信息。我们邀请了东西方 30 位演讲者发表讲话，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交流氛围，相互尊重，并具有真正的对话精神。在以下照片报道中，我们希望与您分享这种氛围。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教授 Tomáš Halík 蒙席与印度古瓦哈提荣休总主教 Thomas Menampampil。 (Khe, 摄)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嘉宾郭金才主教（中国承德）发表演讲，岳福生主教、孙建平和朱杰神父参加前两天的会议。(Khe, 摄)



法国 Reims 教区 Eric de Moulins-Beaufort 总主教 (Khe, 摄)



蒂尔堡大学 Erik Borgman 教授



Stijn Van den Bossche 教授 (Khe, 摄)



香港圣神中心 Erica Siu-Mui Lee 教授



香港圣神中心 Vanessa Siu-Wai Cheng 教授



在鲁汶大学神学院的“Grote Aula”，由韩德力神父圆满结束了第十五届国际学术论坛。（Khe，摄）



9月29日，32名中国教友参加了教宗在布鲁塞尔主持的弥撒。



11月11日，22名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两名天主教徒，其他为非基督徒）在鲁汶中国书苑聚会分享，并举行中文弥撒。

2024年9月26日，内蒙古天主教呼和浩特教区鄂尔多斯城川堂区迎来了开教150周年。弥撒庆典在城川天主堂举行，由呼和浩特教区孟青录主教祭及25位神父参礼，弥撒庆典在一首蒙汉双语的《光荣颂》的合唱声中拉开序幕。来自各地的修女和千余名教友们分享了这份喜悦与欢乐。

1874年，圣母圣心会的德玉明 (Devos Alfons)、费尔林敦 (Verlinden Remi) 两位比利时神父来到城川努力学习蒙古语和当地文化，当年7月盖起3间柳笆屋成为城川的第一座天主教堂。1882年，传教士们在城川盖起8间堂屋和20多间住屋，这里就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蒙古族教友堂区。



南怀仁基金会 — 使命宣言 —

南怀仁基金会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简称 VF) 在比利时鲁汶合法登记立案。

圣母圣心会于 1981 年举行的第九届修会总大会时，针对修会过去曾在中国华北地区 90 年 (1865-1955) 传教历史，做了一次回顾与评估，并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实现修会自 1862 年创办以来，会祖南怀义神父 (Theophile Verbist) 在修会会宪制定的“中华优先”之福传使命。于是，圣母圣心会于 1983 年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来落实并更新圣母圣心会的“中华优先”原则。南怀仁基金会的任务是与中国以及全球华人团体发展一个新的合作和交流关系。此后，南怀仁基金会一直秉持这项使命，透过举办各种对话、合作和交流活动，来实践传统的圣母圣心会“中华优先之”使命。

近二十三年以来，南怀仁基金会在台湾有今天的成就和发展，皆归功于圣母圣心会、台湾平信徒以及教会领袖的奉献精神与重要贡献。2006 年，圣母圣心会将南怀仁基金会转移到比利时的“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如今是合法登记立案机构。鉴于其宗旨并且对普世教会的开放，南怀仁基金会不将自己视为隶属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它是一个“蒙福音和梵二精神启发的国际性天主教团体”。

南怀仁基金会团体成员来自东西方，其中包括教区神父、圣母圣心会和圣母圣心修女会传教士、平信徒以及非基督徒成员，每位成员都基于自己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为基金会的宗旨贡献力量。他们分别在鲁汶（比利时）和台北（台湾）的研究中心工作。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董事会成员，这对于实现基金会的宗旨非常必要。

南怀仁基金会愿意与“无神论”、“各类哲学思想”以及“不同宗教信仰”进行对话并且保持开放态度，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相互理解和兄弟情谊，同时在我们现代世俗化社会中追求进步和

福祉。“求同存异”最能够表达南怀仁基金会的宗旨，亦即我们与合作伙伴在对话中找寻我们彼此有共识的议题，同时与我们抱不同观点的议题也表示彼此尊重。

南怀仁基金会制定了三个活动计划来落实其宗旨：

1. 牧灵和社会交流与合作计划
2. 学术研究计划
3. 文化交流计划

鲁汶南怀仁基金会有两个机构，两个机构同属一个管理单位，“鲁汶南怀仁研究中心”与天主教鲁汶大学合作，也使用鲁汶大学提供的办公室办公。另一个是“鲁汶仁义书苑”，它也称为“南怀仁基金会之家”，从事研究或参与南怀仁基金会活动的同仁住在仁义书苑，凡承认这是“普世基督徒兄弟友爱团体”者，方可在此屋檐下度团体生活。

在台湾，南怀仁基金会尊重并承继台湾牧灵中心 (TPC) 的传统精神和部分项目，包括为牧灵人员提供牧灵、教理讲授和教会社会思想领域的培训计划。南怀仁基金会希望能加强与辅仁大学的合作，这任务是交由台湾“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负责。

了解并支持南怀仁基金会的中国计划

南怀仁基金会是以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而命名的，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清康熙皇帝的老师。本基金会于 1982 年由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创立。

南怀仁基金会赞助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以及台北南怀仁研究中心（位于中央大楼八楼）的活动。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也赞助鲁汶仁义书苑。透过这些机构，基金会积极推动中国教会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及与中国教会牧灵合作交流。

南怀仁基金会的优先关怀是：与中国教会发展开放性对话交流，积极响应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以及教宗方济各的对话之路。

帮助中华各地教会最有效之道，在于投入教会人员的培育。因此，本基金会对中华各地教会牧职人员（神父、修女、修士、教友）的培训提供支和奖学金，也邀请神职人员到欧洲、台湾或菲律宾的一些学院接受福传方面更专业的培育，期盼他们学成归国后，到各修院及培育机构授课。

白满思 (Paul Braeckmans) 先生是本基金会在美国的代表。

地址： 624 Washington street, Alhambra CA 91801, America.

E-mail: paulbraeckmans123@gmail.com



Secretariat:
Theresa.Hao & Pieterackerman
Vlamingenstraat 1, 3000 Leuven,
teresajianling.ho@fvi.kuleuven.be

Redaction:
Jerome Heyndrickx, Lucia Wong,
Pieter Ackerman

Cooperateurs:
Marie-Cécile Herbecq, Tom McGuire

Responsible editor:
Verbiest Foundation